

钗黛里形象的B面

郑磊●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王熙凤

『反封建』VS『大色空』，到底哪一个是『红楼梦』真正的主题？
打破思维定势——民间红学新锐清算百年窠白。

郑磊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红楼梦：

钗黛里形象的B面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：钗黛形象的 B 面 / 郑磊著. —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224-07636-8

I . 红... II . 郑... III . 红楼梦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 IV 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0612 号

红楼梦：钗黛形象的 B 面

编 著 者 郑磊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（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：710003）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16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24-07636-8/I · 1210

定 价 25.00 元

弁言

题曰：

甄士稀逢贾化繁，石头苦谛世难传。

风月鉴里说多情，不若反照思奇缘。

伟大的作品常常催生出专门的学科。所谓“红学”，就是由不朽名著《红楼梦》而派生出来的一门专项的研究。从 18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 80 年代，红学已经历史性地经历了“评点派”、“索隐派”、“考证派”和“政治评论派”四个发展阶段。其中，“评点派”、“索隐派”属于“旧红学”的范畴，“考证派”及其“自传说”是“新红学”的核心。自 1954 年以来，“政治评论派”对“考证派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，逐渐确立了其在红学领域内的“绝对统治地位”（三人战斗小组《〈红楼梦〉是一部政治斗争小说》）。然而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，不仅昔日的新、旧红学已趋于式微——索隐之路已被证明走不通，考证挖掘亦很难再发现新的史料，就连号称“以马列主义指导红学研究”的政治评论派，也陷入了越来越大的困境之中。新的论文，新的著作，固然还在一篇一篇地发表，一部一部地出版，但绝大多数都不过是在重复老观点，或者在既有结论的基础上作一些枝节性的、无伤大雅的小修小补。据云，一些“爱好红学的朋友们聊天”，已经开始提出“红学研究应该朝哪个方向去突破？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取得较大进展”等问题。另一些敏感的学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红学研究已“面临危机”，“似无路可走”（见《红楼梦学

刊》1990年第一辑)。1996年2月21日《文汇报》对一次红学会议的报道,就充分反映了当代红学的这种“危机”状态:

(小说评论派)能否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继续发展下去,一些学者是表示怀疑的。……他们认为,这一派的历史也不短了,种种题目的文章都做过,其篇幅已几十几百倍于《红楼梦》小说本身。今天还在做文章,已无多少新意。为了维持红学的发展,它还得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老话题。……(姜洪文《“红学”之路怎么走?》)

难道“红学”真的走入了山穷水尽的“绝境”,只能靠“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老话题”,来画饼充饥、聊以自慰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我们看到,一方面,传统的红学已危机重重、步履维艰,似乎该说的话都已说尽,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定论;但另一方面,对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,却还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地、处女地,从未被人耕耘过!而即使在那些看上去似有“定论”的领域,也普遍存在着粗耕糙作、浅尝辄止的现象。所得出的那些所谓的“定论”,亦未必经得起认真的推敲和检验!以钗黛问题为例,传统的红学就实在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。譬如,传统红学向来把宝钗判定为所谓的“卫道士”,把黛玉判定为所谓的“叛逆者”,但《红楼梦》全书却偏偏以宝钗的《螃蟹咏》骂世最狠,以黛玉的《杏帘在望》“颂圣”最力!这究竟该作何解释?第十八回,钗、黛均作“应制诗”以称颂元妃。照一般红学家的看法,宝钗此举自然是“有意讨好”,黛玉则多少是出于“不得已”。可小说却清清楚楚地写明,“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,将众人压倒”,一心要博取元妃欢心、满堂喝彩的,恰恰是黛玉,而不是宝钗!脂砚斋也明确指出,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,“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,在黛卿实不足一为”(庚辰本第十七、十八合回双行夹批),在宝钗“此不过颂圣应酬耳”,在黛玉却有着“以幻入幻,顺水推舟”的机心。这又该作何解释?多年以来,在红学家们的笔下,尤其是那些“拥林派”红学家的笔下,黛玉被描绘成一个清高、孤傲、一尘不染的仙子形象;宝钗则被涂抹成一个“老于世故”、“八面玲珑”、一心欲夺“宝玉奶奶”之位的角色。可我们却看到,在第四十回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这样的关键时刻,恰恰是黛玉以自己殷勤的接待、周详的礼数,博得了贾母的欢心;而宝钗蘅芜苑“雪洞一般”的居室布置,却引起了贾母的严重不悦,以为甚是“忌讳”、“离格”!那么,又到底谁更“清高”,谁更“圆滑”呢?第

二十二回，宝钗的一首灯谜诗，竟引得贾政大为扫兴，以为“小小之人作此词句，更觉不祥，皆非永远福寿之辈”。相比之下，黛玉作为一个所谓的“叛逆者”，她又是否有过宝钗这样的敢于直接开罪家长权威的举动呢？为什么小说中像“何幸邀恩宠，宫车过往频”，“双瞻御座引朝仪”，“主人指示风雷动，鳌背三山独立名”这样的明确表示自己渴慕功名、向往恩宠的诗句，恰恰皆出自黛玉之口？为什么像“漫搢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”，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处处风波处处愁”，“虽是半天风雨过，何曾闻得梵铃声”这类明显具有禅宗、老庄之忧世、愤世倾向的辞藻，又偏偏皆同宝钗相关，俱出于她的推介或原创？进入到宝、黛、钗三人之间的爱情领域，人们说黛玉是宝玉“志同道合”的知己，宝钗与宝玉在思想上则“处处相反”、“完全对立”；可脂砚斋却公然提示读者：“钗、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。……二人之远，实相近之至也。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，却远之至也”，“钗与玉远中近，颦与玉近中远，是要紧两大股，不可粗心看过！”内中的道理又究竟何在？很多人喜欢拿《终身误》中所谓“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盟”一句，来证明宝玉对黛玉的“专情”，以为作者“右黛左钗”的倾向，“原甚明显”。但在甲戌本第八回题头诗——《金玉姻缘赞》里，作者却也同样写下了“莫言绮縠无风韵，试看金娃对玉郎”的忠告。若依此而论，则作者“右钗左黛”的倾向，不也“原甚明显”吗？——不用多举，只从有限的这么几个例子当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，传统的红学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是何等的粗线条、想当然，是何等的挂一漏万、破绽百出！当然，绝不仅仅是钗黛问题，余者如宝钗“冷香丸”的配方，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“十二”字样？为什么要历尽春秋四季，遍尝甘苦二味？在此起什么艺术作用？黛玉“人参养荣丸”、“天王补心丹”又有何种寓意？为什么作者说这些丸药“都不中用”，需要古坟里死人戴过的珠子，才能治好黛玉的夙疾？金钏作为王夫人的丫鬟，她为什么偏要去穿宝钗的“旧衣服”？作者为什么还要专门点出她与宝钗“身量也对”？小红为什么也偏偏姓“林”，叫做“林红玉”？这白金钏与薛宝钗，林红玉与林黛玉之间，又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？癞僧、跛道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于红尘闹市？“贾天祥正照风月鉴”和“通灵玉蒙蔽遇双真”是怎么回事？作者为什么写下这两段奇奇怪怪的文字？还有，癞头和尚作为出家人，为什么还偏要管人姻缘，发话让宝钗与宝玉配为婚姻？他不是明明知道所谓“木石前

盟”的神话么？可他为何还偏要站在“金玉姻缘”的一边？小说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一回出现的十四首灯谜诗，除第一首之外，余下的十三首，谜底为何物？其寓意又是什么？那位“真真国女孩子”，又系何许人也？此外，在第二十二回，宝钗生日的这一天，作者为什么要专门引出《山门·寄生草》的唱辞？同样地，在第六十三回，宝玉生辰夜宴，宝钗抽取“花名签”的时刻，又为什么要专门引出《邯郸梦·赏花时》的唱辞？这些戏辞曲文，对于小说的总体构架，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？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这些都显系传统红学所从未涉足或者很少涉足的领域。且不说这样一些例子，就连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，如作者为什么要写甄、贾两个宝玉，畸笏叟为什么申言“将薛、林作甄玉、贾玉看书，则不失执笔人本旨”，一些红学家也不得不承认“至今也没有完全领会”（见《红楼梦学刊》1990年第三辑）。——显然，如果把《红楼梦》比成一座巨大的金矿的话，那么，迄今为止，被传统红学所挖掘出来的，亦仅仅是冰山一角。就在红学家们纷纷感到已无话可说的同时，其实大量的秘密还从未浮出水面。所谓“红学”的危机，绝不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本身，已达到了臻于完满，再无可挑剔，再无法改进的程度；而恰恰是狭隘的视野、陈旧的研究方法，阻碍了这一学科的继续前进，犹如落后的采掘工具曾经一度阻碍了人们向地层的更深处进军一样！怎么办？时代在变迁，“矿业”在发展，红学也要呼唤新的观察视角、新的研究方法。自然，我们所说的求“新”，亦并非刻意地“标新立异”，制造哄动新闻。所有的“新”，都必须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取证、分析。我们需要的，是一种尽可能摈弃后世成见，却更加贴近于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新视角，以及一种灵活巧妙，却尽可能植根于《红楼梦》文本本身，而非先验地来源于某种现成文艺理论（如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、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）的分析手法！
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笔者不揣冒昧，斗胆推出了这么一篇即将开罪于读者、开罪于世人、开罪于两百年来“红楼定势思维”的小文。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拙作的标题就叫做《红楼梦：钗黛形象的B面》。何谓之“B面”？自然是与“A面”相对了。所谓“A面”，也就是“正面”、“表面”，人人皆见、人人皆知、人人皆信而不疑的这一面。然而，《红楼梦》却犹如书中的“风月宝鉴”，实在是具有“两面皆可照人”的性质。曹、脂诸人反复提醒我们的，恰是：“观者记之，不要看这书正面，方是会看！”（庚辰本第十二回双行

夹批)“是书勿看正面为幸。”(甲戌本第八回侧批)所以,对于《红楼梦》的研究者而言,更重要的,倒恰恰应该是从与这个“A面”相对的“B面”出发,从“反面”、“背面”,人人皆未见、人人皆不知、人人都没有认真反思过,却又的确深藏机杼的这一面上,去参透作者的真意。窃以为,惟有如此,方不辜负曹雪芹“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”的感叹!本文既然以“钗黛形象的B面”为题,行文的重点,自然是在于分析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、心理情感。但笔者并不打算仅仅停留于此。我们将以分析人物形象为契机和切入点,逐步展开,对《红楼梦》的题旨、主线、惯用艺术手法,乃至作者的写作心态和创作意图,均作出相应的论述。鉴于《红楼梦》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——她有她复杂的成书过程和版本系统,更有其复杂的思想倾向和内容结构,故我们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,必须首先作出以下几点声明,以免日后的纠缠不清:

1. 本文以脂评本及其后三十回佚稿为研究对象。《红楼梦》现存两大版本系统:脂评本与程高本。本文所分析之人物形象、情节内容、线索主题,均基于脂评本中的创作描写,除有特殊需要,一般不涉及程高本中的情况。又,脂评本除三十回佚稿外,曾经还存在过另一种不同的早期续文,即所谓“旧时真本”系统。本文的研究对象,一般亦与此本的内容无关。[注1]

2. 本文以探究曹雪芹的原始创作动机和写作意图为目的,立论行文只以《红楼梦》本身的文本事实为依据,而绝不受那些在后世读者中普遍流行的观念、印象的束缚和左右。笔者并不反对后世读者从不同的立场,诸如“才子佳人”——“拥林派”的立场、“反封建”——“阶级斗争”的立场、“人性解放”——“女权主义”的立场,去解读《红楼梦》。但坚决反对论者用自己的这种立场,去代替、消解作者原有的思想体系。而以为这些后世意义上的解读,只能严格限定在接受美学的范围之内,不能喧宾夺主,反过来干扰人们对曹雪芹原构思的认识。

3. 基于第二点,本文在具体分析《红楼梦》之人物形象、艺术手法、篇章布局的时候,将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西方(包括俄国)的、现代的文艺理论,而更多地立足于《红楼梦》自身的艺术特点,立足于曹雪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、所置身的那个阶层的思想形态和审美理念,以尽量减少用后世臆想代替前人构思的情况。

4. 本文的立论与取证将多处涉及脂砚斋、畸笏叟等人的批语。自然，我们不能神化脂批。事实上，脂砚斋等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见解，也的确没有达到所谓“句句皆是真理”的程度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，脂砚斋、畸笏叟等人，作为曹雪芹生前的知己和《红楼梦》的参与创作者，其对于作者和作品的了解之深、见解之透，却又是任何其他读者所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。其最大的一个优势便是，他们可以随时同作者进行观点上的切磋讨论，以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认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脂砚斋的想法完全等同于曹雪芹的想法。但一芹一脂，亲密无间，思想融洽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，却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。《红楼梦》一书原名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。实际上，这一书名本身，就表明了作者希望脂批与他的《石头记》“相伴而生”、“永存共葆”的心愿。脂批是《红楼梦》原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尽管脂批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，但在探究曹雪芹创作动机、原始意图，尤其是涉及全书主题、主线、主要人物的评判方面，它仍然是研究者绝对不可轻视的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材料。只是我们在立论、取证之前，应首先辨别出脂评本中哪些批语是真资格的脂批、笏评，哪些批语是鱼目混珠的“伪脂批”——立松轩等人的评语。将“松批”误为“脂批”，这是在以前的脂批、脂本研究中经常发生混乱的一个根源。读者在对照阅读戚序本及蒙府本《石头记》的侧批及回前、回后总评时，这些地方尤其应加以注意。

5. 本文在分析《红楼梦》的题旨、要义方面，将多次运用到佛教和道教的哲学、美学思想。毫无疑问，曹雪芹是坚决反对世俗意义上的佛教和道教的——这是指烧香建庙、念经诵咒、打醮祈福、采气炼丹一类的迷信活动。作者写了张道士、马道婆、王一贴、葫芦庙小沙弥、水月庵老尼静虚等一系列的人物，就是为了暴露这些世俗宗教徒的虚伪。但去掉世俗功利的成分，上升到哲学、美学的层面，无可讳言，曹雪芹又深受佛、道，尤其是禅宗、老庄思想的影响。《红楼梦》中“一僧一道”——癞头和尚（茫茫大士）与跛足道人（渺渺真人）的存在，就是明证！此外，脂砚斋亦多次毫不含糊地宣称，《石头记》系由“宗庄”、“宗老”而来。这也是明显的证据。鉴于此，本文将尽可能地从贴近曹雪芹、贴近于他们这些“旧家子弟”、“破落贵族”的角度，去运用这些佛、道方面的思想。而一般地，不对这些思想本身的“是”与“非”、“对”与“错”或者“进步”与“反动”进行评述。

6. 本文主要由“弁言”、第一至四章、“观点总结”六部分组成。第一章《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：钗黛性格的B面》，主要分析《红楼梦》中的两位女主角——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“背面”，分析她们向来被人忽视，其实却更为本真的“另外一面”。第二章《“借影”新说：钗黛的另一对影子》，从分析钗黛的另一对影子——金钏与小红入手，谈《红楼梦》在追摹人性方面的独特审美观，以及这种审美观是如何同一般世俗的审美习惯发生冲突的。第三章《“困境”与“救赎”：钗黛合一的真谛》，剖析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救赎意识，并由此探讨作品中“钗黛合一”的实质和“钗黛分殊”的情由。在此基础上，破解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一回的十四首灯谜诗，分析这些文字在全书中的意义和作用。第四章《“远中近”与“近中远”：宝玉情感的B面》，通过分析宝玉同宝钗、黛玉在爱情上的亲疏远近、纠葛纷争，全面阐释《红楼梦》之“风月宝鉴”性质在艺术上的运用。并通过解读钗、黛对宝玉一生最终起到的不同作用，进一步论证《石头记》全书的“色空”主题。最后，“观点总结”，对以上各章的内容，进行总结、概括。除此六部分之外，本文亦配有“附注”，对各部分尚未说尽、说透的问题，进行补充说明。这些地方，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，是一座罕见的文学迷宫。笔者才疏学浅，绝不敢自夸穷尽了其中的多少秘密，或者有什么“终结”红学的力量。只希望以这篇小文，给所有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们及广大《红楼梦》的爱好者，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一种新的阅读视角，从而起到抛砖引玉之用。若红学真的能因此而稍稍摆脱多年来的低迷，甚至进而摸索到一条新的前进之路，则幸莫大焉。

目 录

弁言 / 1

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：钗黛性格的 B 面 / 3

“借影”新说：钗黛的另一对影子 / 41

“困境”与“救赎”：钗黛合一的真谛 / 63

“远中近”与“近中远”：宝玉情感的 B 面 / 109

总结 / 187

附注 / 195

附录一 作者与红楼网友的对话 / 225

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/ 243

黛玉：身处『世外』而心向『世内』



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：钗黛性格的B面

题曰：

双美争妍二百春，再笔情缘话浅深。
蘅芷清芬谁堪识？洞天别有烈性真。

凡认真读过《红楼梦》的人，都一定会感到，这是一部博大精深又纷繁复杂，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的奇书。书中有太多的未解之谜，尚等待着人们去挖掘、探索，更有许多相关的疑问，一经提出，便往往会在读者群中引发长久的争议。小说中的钗黛问题，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最富于争议性的话题之一。宝钗与黛玉，这两位女主角，究竟孰优？孰劣？哪一位才是宝玉合适的妻子？自《红楼梦》面世以来，人们一直为此争执不休。据说，历史上的“拥林派”和“拥薛派”，甚至可以因此闹到“一言不合，遂相龃龉，几挥老拳”，以至于“誓不共谈红楼”的程度（见邹弢《三借庐笔谈》）。如此的争论，可谓激烈之至矣。然而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却可能同时为论辩的双方都不曾注意到。什么现象？“拥林”与“拥薛”的双方，虽然表面上争得你死我活，誓不两立，但其内心深处却又都默认一种完全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——两百多年来，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所谓“理性的、功利的、世俗的、有心计的”这一面，判定给宝钗；将所谓“感情的、艺术的、个性的、任情任性的”这一面，判定给黛玉。然后，再就这种两极化分派的结果，进行褒林贬薛或者褒薛贬林的评述，却很少有人反过来想一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存在题，想一想宝钗是否也具有“感情的、艺术的、个性的、任情任性的”一面，黛玉是

否也具有“理性的、功利的、世俗的、有心计”的一面！“拥林派”固然利用这种片面的分派，大做文章，一方面盛赞黛玉的“纯洁”、“孤高”、“叛逆”，一方面将宝钗指责成所谓的“乡愿”、“巧伪人”和“城府甚深”的“阴谋家”。而“拥薛派”虽然极不赞成这种荒诞无稽的指责，却也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社会功利的立场上，来为宝钗辩护的——也没有对这种分派本身提出疑义。长此以往，久而久之，早期的习惯和定见，变成了后期的迷信和偏见，乃至人们一提到宝钗，便仿佛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；一提到黛玉，便仿佛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。于是，有“聪明”的读者喊出了这样一句有名的口号：“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，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！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，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！”（王昆仑《红楼梦人物论》）一位曾经在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饰演过林黛玉的女演员，更是代许多人说出了他们心目中对于钗、黛的主观印象。她说：“黛玉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人物，她的本质是和自然的东西对话；宝钗却是一个世俗的美女，她距离更高的那一层境界还差得很远。”（见《陈晓旭北师大访谈录》2001年3月19日）这样的说法，自然是极大地迎合了世人，尤其是那些“拥林派”读者的看法。可事实果真如此吗？原著中的宝钗与黛玉真的像这些人描述的那样，是一个“世俗”、一个“理想”这么简单么？近年来，随着传统红学的日趋没落和若干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，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有人说：“林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并非纯精神的，也包含着物欲的那一面，并且具有很强的世俗性。她对贾府和宝玉未来的关注，她的一首诗《杏帘在望》是最好的注脚。”（梅玖、阎大卫《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》，原载《求是学刊》2002年第二期）有人则指出：“以前将薛宝钗的一举一动都视为企图夺爱于黛玉的阴谋，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……其实，和黛玉相比，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，倒反而有更多的非世俗的、理想主义的成分。”（钟长鸣《红楼五日谈》，原载《北国之春》2003年第十期）新说甫现，一时间争议再起。但与以往不同，此次争论却并没有仅仅停留于“拥林”或“拥薛”之上，而是直接指向了原先那种两极化的分派本身。于是，我们看到，昔日那些似成定论，从未被人触动过的种种说法，也就不能不在新的反思面前，渐渐变得苍白、模糊了起来……

其实，在笔者看来，所谓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也好，“感情”与“理性”也好，“性灵”与“功利”也好，任何一种试图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概括钗黛形

象之内涵的做法，都难逃削足适履之嫌。人们读《红楼梦》，总喜欢从非黑即白、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出发，将书中的人物脸谱化、模型化。殊不知，小说里的钗、黛均如同那件“两面皆可照人”的“风月宝鉴”，其性格都有着截然不同的A、B两面！什么是“A面”？我们在《弁言》中已经说过，“A面”就是人人皆见、人人皆知的这一面。虽然是人人皆见、人人皆知，却不免流于浅表，未必能反映出人物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东西。又，什么是“B面”？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说，“B面”就是鲜为人知、被人忽略了的这一面。虽然其相对隐蔽，不易察觉，但可能才真正反映出了人物内心深处更核心、更本质的内涵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——《红楼梦》的写人，充满了老庄的辩证色彩。这种情形，显然是很难用简单的概念去指代人物的真性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一定要用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这样的词汇来描述、界定钗、黛的话，我们只能说，宝钗、黛玉皆兼具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两方面的特性，每一位身上都包含了“人性最基本的‘吊诡’（悖论）”（王蒙语）。而更确切地讲，宝钗实际上是“世俗世界”中的“理想主义者”，黛玉实际上是“理想世界”中的“世俗主义者”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黛玉是身处“世外”，却心向“世内”；宝钗是身处“世内”，却心向“世外”！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呢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顺着“理想”与“世俗”这两条线索，深入到小说的“反面”、“背面”，对钗、黛的思想本质、心理性格作一番详尽的剖析。

先说黛玉，她的实际情形，就与许多人的想象大不相同。在一般人的眼中，黛玉大约是一个“极清高”、“极不善于处世”的女孩，不比宝钗“老于世故”、“八面玲珑”。不错，从表面上看，黛玉的为人处世，也确实不及宝钗那样圆熟练达。但如果你肯于沉下心来细细观察的话，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。——事实上，黛玉对于世俗利益及地位、声望的关注和向往，却又是远在于宝钗之上的！换句话说，黛玉只是在“入世”的客观能力上输给了宝钗；但在追求世俗名利的主观意愿方面，却又远远地强过于她！何以见得？小说第七回，“周妇送宫花”一事中，黛玉的表现，即为明证。此一回，小说交代，“周瑞家的”应薛姨妈之请，挨个给众位姑娘送去宫样的纱花。在别的姐妹处，都无甚余话，唯独到了黛玉这里，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。作者这样写道：

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，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

呢。周瑞家的进来笑道：“林姑娘，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。”

宝玉听说，便先问：“什么花儿？拿来给我。”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。开匣看时，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。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，便问道：“还是单送我一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各位都有了，这两枝是姑娘的了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周瑞家的听了，一声儿不言语。

——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读者请看，仅仅是一个送花顺序的问题，就让黛玉把它与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高下联系了起来！试想，黛玉若不是十分在意于她在现实社会中的名利得失的话，又何至于过激如此？自然了，“拥林派”的论者一定会站出来，拿“清高”、“自尊心强”等词汇来为黛玉辩护。更有甚者，有人则干脆曲为解释，把黛玉这种表现说成是“她用‘比刀子还利害’的话语，投向庸俗与虚伪”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红楼梦鉴赏辞典》“人物形象”部分/章培恒、陈建华文）。但问题是，此时“周瑞家的”应薛姨妈之请，好心好意地为众小姐送宫花，这样的行为，又有哪一点“庸俗”，哪一点“虚伪”呢？如此的举动又是否真的伤害了黛玉的“尊严”呢？到底是别人“庸俗”、“虚伪”，还是黛玉自己的一颗名利之心太过于强烈？至少，后者的因素绝不会小于前者。黛玉如果不是汲汲于世俗的等级、位秩，她也就根本不会在两枝小小的宫花之上，再生出什么别的轩轾来了。

黛玉是个薄命的女孩，诚如她自己所言：“我原本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。”（第四十五回）然而，也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不幸，在她的内心世界造成了强烈的自卑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一个人愈是自卑，便愈容易滋生出强烈的出人头地、高人一等的占有欲。这是一种压力与反弹的关系。而古人所谓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”（品位高的人常常胸怀坦荡，品位低的人总是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）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。黛玉的心态，差不多就属于这样的情况。她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，便越要施展自己的种种才华，运用自己的种种心计，以博得显要的位置，“将众人压倒”。这种急切的心理，以至于使她在第十八回，对元妃竭力奉迎的时候，不经意间便暴露出了自己的心迹：“何幸邀恩宠，宫车过往频”，“盛世无饥馁，何须耕织忙”。以“颂圣”而“邀宠”，以“邀宠”来“大展其才，将众人压倒”。亦诚如